

水洞沟遗址： 科学与人文在这里交融

高 星

文明之声

核心阅读

政府部门、学术机构与企业密切合作互动，各自发挥优势和专长，遗产保护和利用并重，学术与科普互促，最终实现保护、科研、科普、旅游互益共赢。水洞沟遗址这种保护实践模式，对其他史前旧石器时代的大遗址具有借鉴意义

在中国西北苍茫的毛乌素沙地和滔滔东流的黄河之间，宁夏水洞沟遗址坐落于此。

约4万年前，一群从北方迁徙至此的狩猎采集人来到这里，安营扎寨，开始书写水洞沟地区的古史。其后，陆续有先民到此生产和生活，续写史前文化篇章。至5000年前，新石器时代人群仍在这里打石制陶，传递文明的薪火……

1474年，自横城至盐池的长城落成，它成为明代长城的一部分。1697年，清朝康熙皇帝御驾亲征准格尔部，循长城南侧古道穿水洞沟而过，留下历史的印记。

1923年，两位法国古生物学家在水洞沟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证明中华大地在远古就有人类生存繁衍，其后学者不断到此发掘和研究。

如今这处古遗址焕发了新的活力，成为考古学和地质学的科考基地和人才培养的田野学校、中小学研学的露天课堂。它也是我国唯一一处以史前遗址为核心的国家5A级景区，是游客体验文化遗产保护的旅游之地。

持续的考古不断深化遗址的文物价值

水洞沟遗址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国际学术界赫赫有名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该遗址由若干地点组成，散布在黄河的支流边沟河两岸，埋藏着距今4万年至5000年前不同时期、不同人群、不同生活活动所留下的遗物与遗迹，勾画出一幅幅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先民在此迁徙交流、生息劳作、薪火相传的历史画卷。

第1地点最早被发掘和发掘。法国学者桑志华、德日进根据这里出土的石制品和动物化石于1925年在国际学术界率先发文，宣布遥远的东方存在旧石器时代先民留下的文化遗存；这里出土的器物文化处于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期的莫斯特文化向晚期的奥瑞纳文化发展的中间环节，当时发生过东西方人群的远距离迁徙。其后该地点又被发掘出更多的遗物和遗迹，表明4万年前带有特定技术的人群到此生产生活，其重要性愈发突出。这里出土的规范、长薄的石叶制品被认作早期现代人的文化标识，在欧亚大陆西部和西伯利亚广泛分布，在东亚却是凤毛麟角，有学者据此支持现代东亚人群是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在非洲诞生并自西向东迁徙的早期现代人的后代的论断。

但第2地点给出了不同答案。这里出现距今3万年前的多个文化层位和丰富多彩的文化遗存，将古人类的生存行为演绎得更加绘声绘色。该地点的石制品显示出与第1地点不同风格，回归在华北延续了百万年的小石片文化传统，但一些石器加工得规整、精

细，说明技术与文化在发展和跃变。该地点还出土少许精致的磨制骨器和逾百枚用鸵鸟蛋皮制作的磨圆、穿孔、染色的串珠，表明当时这里生活着一群爱美的“水洞沟人”。精致的石器、磨制骨器、装饰品、艺术创作表明这里本土的古人群也已演化进入现代人的行列。该地点还保留密集分布的火塘，表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形成聚落社群。从石器上提取的使用痕迹和残留物表明，当时的先民已在对特定的动植物资源做深度开发利用。

2017年，在第12地点展开的考古获得了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该地点出土1.1万年前的丰富文化遗存，包括技艺精湛的细石叶制品，精美的磨制骨针，骨梭形器，骨柄石刀，石磨盘与石磨棒，精巧的磨制小圆石饼等。梭形器的出现表明当时的先民已会织网，以此捕捉飞鸟和快速奔跑的羚羊、野兔，遗址出土的这些动物的碎骨是当时人类的厨余物。石磨盘与石磨棒在后期的农业遗址中常见，表明农业的雏形在这里出现。尤为重要的是，经过对遗址大量碎石的多学科分析，发现这里的先民已经在用石煮法，即将石头烧热，放到水中使水沸腾，把浸在水中的食物煮熟。对这些遗存的考古发掘和信息解读，显示这里正在实现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狩猎采集生计向农业经济的转型，数百万年迁徙游动的栖居模式向定居转变。

这些重要的人类历史过程节点和证据，都埋藏在水洞沟遗址漫漫的黄沙和层叠的褐

土下，通过持续的考古不断被发现。

保护、科研、科普、旅游可以互益共赢

旧石器时代遗址，尤其是旷野土遗址的可视性和观赏性较差，对社会大众的旅游吸引力不强。虽然该遗址在考古界早已闻名遐迩，但很长时间这里只是人迹罕至的荒漠和残垣断壁。如何让文化遗产活起来，让大众能看得懂、感兴趣，让游客在这里既能得到文化的熏陶，也能获得休闲娱乐的快乐？

在考古专家建议下，水洞沟遗址博物馆首先建立起来。水洞沟的管理者到国内外的相关博物馆考察、取经，形成了自己的思路，并与鲁美艺术学院、沈阳工学院的博物馆设计人员和文物考古专家一起反复研讨、推敲，最终形成了博物馆建筑与展陈设计方案。

在2011年的“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水洞沟遗址博物馆正式落成对外开放。遗址博物馆通过图片和雕塑系统地展示了水洞沟遗址发现、发掘和研究的历史，用实物、图片和立体场景复原等手段再现了4万年至5000年间先民在这里狩猎采集、生存繁衍的情境。博物馆内最具创意和吸引力的展示单元是沉浸式远古生活体验馆。该体验馆将声、光、电、幻影成像、动漫、地震平台对接等高科技手段和实景、古环境艺术再现等方式，让游客置身史前环境中，近距离观赏先民制作工

具、狩猎采集、载歌载舞的一幕幕片段，身临其境体验狂风骤雨、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对人类生存的影响。

他们在遗址附近设立古人类生活体验馆，为观众表演先民工具制作和资源获取的技艺，让游客亲身体验制作石器、拉弓射箭、钻木取火烤熟肉食，让游客体验远古生存。教育部门推出中小学研学游项目以来，这里的仿古体验活动成了孩子们的最爱，他们在模拟发掘现场学习精耕细作的考古发掘流程，了解科学家撰写人类史书背后的故事，领悟到人类演化到现代这一征程的坎坷和卓绝。

在遗址保护方面，政府有关部门编制并颁布实施了《水洞沟遗址保护规划》，使遗址的保护、管理、利用和发掘、研究有章可循；妥善处理了在遗址区开展基础建设与遗产保护之间的矛盾；将遗址区内的土长城加以修缮，使水洞沟遗址和明长城这两处国保单位交相辉映。政府部门与企业准确把握政策法规的基础上，明确了相关方的责权利，明确了旅游资源开发不可触碰遗址本体、不可损毁文物、不可破坏遗址环境、不改变遗址管理权限的原则。

在学术方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在遗址做持续的调查、发掘和研究，发现新的地点和文化层位，不断拓展遗址的文化内涵。并以此作为田野学校，展开对旧石器时代考古人才的专业培训，将最新的野外发掘和信息获取技术及理念运用于考古实践，一批批具有国际视野和前沿意识的青年人才不断从这里走出。学者们围绕该遗址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和专著，提出很多具有国际影响力和创新性的观点和论述，还举办过数次国际、国内行业学术会议，推动和深化了有关史前人类迁徙、技术发展、生存模式等问题的研究和交流，提升了我国相关领域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

围绕该遗址的考古和学术成果所进行的公共传播，使该遗址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作用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2018年，第二届旧石器时代文化节在这里成功举办，通过面向公众的科普讲座、石器制作与使用模拟演示、古人类生产生活场景艺术再现、小小讲解员大赛等形式，普及旧石器时代人类技术、文化和生活知识，诠释人类起源与演化的历程和伟业，传递珍视和弘扬人类历史的精髓、保护和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的理念。水洞沟遗址的实践模式可概括为：政府部门、学术机构与企业密切合作互动，各自发挥优势和专长，遗产保护和利用并重，学术与科普互促，最终实现保护、科研、科普、旅游互益共赢。这种保护实践模式，对其他史前旧石器时代的大遗址具有借鉴意义。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图①：水洞沟遗址博物馆仿古体验馆活动。图②：水洞沟遗址博物馆。

制图：蔡华伟

大遗址保护利用的中国探索

曹兵武

大遗址承载着丰富的科学信息、历史记忆、文化精神和社会认同，其自身价值意义的重要性和丰富性，决定了大遗址利用工作的包容性、多元性和复杂性

从旧石器时代的泥河湾遗址群到周口店遗址，从红山文化的牛河梁遗址到2019年成为世界遗产的良渚遗址，从石峁遗址、陶寺遗址到二里头遗址，从2006年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殷墟到横空出世的三星堆遗址，还有长城、丝绸之路、大运河、万里茶路等线性遗产所经过的众多遗址……这些类型不同、时空不同、价值多元的历史遗存都可被称为“大遗址”，它们是人类历史在中华大地遗存的醒目的文明，如何保护与利用，表面是技术问题，实质是文化观的问题。

1997年，由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中首次使用了“大型文化遗产”的提法。自2005年开始，国家文物局相继公布了“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大遗址保护专项规划，并建立了国家大遗址保护项目库。每五年编制专项规划时，项目库曾有所调整，但总体保持了稳定性和延续性。以150处各时期的大遗址为支撑，已累计评定公布36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67处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单位，其中11处大遗址已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大遗址”概念得到普遍认可，成为文物保护利用的重中之重，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增强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凝聚力等方面，作用日益彰显。

大遗址的保护利用情况复杂，水平参差不齐。一些大遗址还存在考古研究滞后、价值提炼不足、利用策略偏差、展示体系欠缺，甚至盲目建设、过度开发等问题。今年8月，国家文物局印发了《大遗址利用导则（试行）》，总结多年的实践经验，对大遗址保护利用具有引领意义。

做好大遗址利用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和引领文物保护与传承。在利用过程中，始终要强调落实管理责任、确保文物安全。《导则》特别明确了直接责任主体应承担的责任，规定了出现文物安全、人员安全和威胁大遗址价值、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等方面的禁止性要求，避免重利用、轻管理、轻保护。目前的大遗址利用仍处于起步阶段，明确管理主体和管理责任尤其重要。《导则》提出，由地方人民政府确定大遗址利用的“直接责任主体”，明确“直接责任主体”及其职责作为大遗址利用的前提性要求，并鼓励各地研究和建立多部门协调机制、文物补偿机制、激励办法和保障措施。

《导则》第一次明确地把大遗址利用分为“价值利用”和“相容使用”两类，并强调主要应以价值利用方式为主。所谓大遗址价值利用是指基于文物本体、文物环境、出土文物，以及价值内涵和相关信息资源等开展的利用活动。而相容使用是指依托文物所在区域的土地、生态资源等开展的利用活动。

一些大遗址处于城市中心，应充分考虑城镇发展需求，承担城镇公共绿地或公共文化服务功能，通过考古遗址公园、遗址博物馆、城市公园绿地、步道以及特定环境景观、建筑或设施等，促进大遗址融入当代生活，成为特色公共文化空间。鼓励以大遗址为核心整合周边环境资源，结合城市更新、旧城改造、文化形象提升等，围绕大遗址价值内涵开展规划与设计，发展遗产旅游和创意产品研发等，形成区域带动的增长点，促进城镇历史文化传承。

一些还在进行考古的大遗址，应以现状保护为主，做好科学研究、宣传教育、环境改善等基础性工作，辅以小规模陈列馆或适当的文物本体展示。在交通可达性好、周边资源丰厚、地方发展水平较高、财政保障条件较好时，可建设遗址博物馆、考古工作站等设施，作为大遗址考古、科研、保护和展示工作平台。

并非所有的大遗址都可以利用。也就是说，大遗址首先要做好保护，做到文物保存现状良好，无重大安全隐患，保障人员安全和文物安全。其次要有明确的大遗址保护利用的专门管理机构，权责清晰，能够切实履行对保护利用的监管职责。必须先期公布文物保护规划，或者文物保护规划和管理规定已公布执行，保护、展示有规可循。最重要的是，考古研究工作具有一定基础，并已编制中长期考古研究工作计划。

对于大遗址依然要坚持最小干预原则，建设项目应严格按照文物保护规划科学选址，避让文物密集分布区域，严格控制建设规模，不得影响文物本体安全、文物价值和景观环境。景观绿化和环境整治项目应突出历史氛围和地域文化特色，避免大规模人工造景。

大遗址承载着丰富的科学信息、历史记忆、文化精神和社会认同，其自身价值意义的重要性和丰富性，决定了大遗址利用工作的包容性、多元性和复杂性。只有将大遗址的价值载体与意义积极融入当代生活，不断丰富内容、提升品质、服务民生，才能促进文物事业走向更加开放、包容的永续保护利用之路。

（作者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总工程师）

“考古中国”聚焦新石器时代重要考古发现

杨雪梅

9月24日，“考古中国”2020重大项目集中讨论了河北康保兴隆遗址、浙江余姚井头山遗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陕西石峁文化及寨山石城遗址等5项新石器时代的重要考古新发现。

这两年，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重大新发现不断，从各个方面颠覆着我们过去的认知。河北康保兴隆遗址年代距今8500—5200年，四个时期的叠压堆积复杂，第一至三期叠压及周边其他同类遗址代表了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具有填补坝上地区史前考古空白的价值。排列有序的房址，长期沿用，反复扩建，结合室内葬的发现，为全面探讨聚落组织、信仰习俗等创造了条件。遗址中发现的丰富动植物遗存，为探讨此特殊环境地带农业的发生及当时生业结构，为复原当时的环境均提供了可能。浮选发现的距今7700年左右的炭化黍（图③），是目前有直接测年数据的最早炭化黍实例之一，是中国北方地区粟黍驯化和旱作农业起源的重要证据。

浙江余姚井头山遗址年代距今8300—7800年，是中国沿海地区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海生贝壳、渔猎动物骨骼和陶器、木器、编织物等，显示出浓厚的海洋文化特征，是中国海洋文化考古和海洋环境研究的重大突破。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考古工作已经持续40年，近期考古重点确认了宫城内最大的宫殿建筑，面积近8000平方米，是迄今发现史前时期最大的夯土建筑基址。基址上部发现2座宫殿及其附属建筑、庭院和疑似鹿苑遗迹，整体布局规整、结构复杂，丰富了陶寺遗址的性质与内涵，对推动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中国等重大课题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考古工作历时6年，确认了谭家岭城址、印信台大型祭祀区、谭家岭高等级敛玉葬、三房湾专业制陶作坊等重要遗址区。出土大量玉器文物（图④），初

步勾勒出距今5900—3800年间石家河遗址群聚落演变过程，为深入了解石家河遗址群的宏观结构与组织分层提供了坚实的支撑，进一步揭示了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生产专业化与社会分层化的总体趋势。

石峁遗址周边石城聚落调查取得新进展，新发现龙山时代石城20余座，遍及榆林地区黄甫川、佳芦河等黄河一级支流流域，面积从数千平方米到400万平方米不等，规模差异明显，其中府谷寨山石城约60万平方米，属于石峁文化的二级聚落。发现21座石峁文化墓葬，形制特征鲜明，器物组合典型、等级区分明显，弥补了石峁遗址墓地被严重盗掘的缺憾，填补了石峁文化研究的空白。

“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一直重点关注中国境内人类起源、文明起源、中华文明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重要地位等考古项目，以持续、系统的考古工作，不断加深对中华文明悠久历史和宝贵价值的认识。

